



岭南大学之父 钟荣光



● 夏明亮

民国年间，对著名大学校长的赞誉，有两个版本：一说是“北有蔡元培，南有钟荣光”，另一说是“北张（伯苓）南钟（荣光）”。可见钟荣光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上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钟荣光早年参加科举，后来投身革命，33岁起担任广州格致书院（岭南大学的前身）汉文总教习，此后40多年致力于岭南大学现代教育的推动和发展，鞠躬尽瘁，不遗余力，直至辞世，被誉为“岭南大学之父”。

“八股名士”投身革命

钟荣光，字惺可，1866年9月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小榄镇一个殷实

的商人家庭。他自幼随经商的父亲到香港读私塾，后返广州就读于专门讲授八股文作法的“大馆”。在名儒吴道镕的指导点拨下，十几岁的钟荣光已能熟练地写作八股文。科举取士被当时的读书人视为惟一正途，钟荣光初涉人生走的也是这条道路。他16岁考上秀才，28岁得中举人，未到而立之年，已驰名广州学界，所作八股制艺文章经常刊载于当时流行的《课艺日新》《文坛帜》等八股文范文汇编上。于是他开始在广州华宁里设“大馆”授徒，“从学者众，收入自丰”。

这时，正值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钟荣光目睹国家陷于内忧外患而报国无门，因而意气消沉，自

甘颓废，与同榜举人江孔殷（后考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天津海关道）等一些文人流连风月，寄兴花酒，过起了旧时士大夫沉迷放荡的生活。

1895年春，钟荣光与江孔殷一同赴京师参加会试。在京师等待放榜期间，传来了中日两国签订《马关条约》，清政府向日本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二万万两的消息。各省到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要求清政府拒绝签约，变法维新，史称“公车上书”。钟荣光与江孔殷也名列其中。此后不久，萌生了革命思想的钟荣光结识了陈少白、郑士良等革命志士，了解到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参与了第一次广州武装起义的筹饷工作，



并于1896年秘密加入了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

由封建士大夫转变为革命党人，钟荣光一改过去自我麻醉的灯红酒绿的生活，经历了他一生中的重大转变。他剪辫易服，以示与清廷决绝；他遣散自己蓄养的婢妾，资助她们读书就业。他认为救国宜首先开通民智，启发民众的爱国觉悟，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于是他与人创办《博闻报》《可报》等报纸，发表了许多抨击时弊、鼓吹革命的文章。不到两年，报馆连遭清廷查封。在办报过程中，钟荣光接触到一些基督教教会人士，对基督教逐渐发生兴趣，接受了教会洗礼，成为一名基督徒。在与一些西方传教士的交往中，他认识到要救国救民，非学习西方先进科学不可，从此，他开始把教育作为终生的事业。

基督教徒环球筹款

岭南大学的前身广州格致书院创始于1888年，是一所由美国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学校。1900年书院改名为岭南学堂，1914年升格为岭南文理科大学，1918年正式称为岭南大学。1899年，钟荣光应邀担任书院汉文总教习，1908年担任岭南学堂教务长，1917年被任命为副监督（副校长）。1927年，岭南大学将办学权收回，钟荣光被推举为首任华人校长。

在旧中国办教育，首当



钟荣光与夫人钟芬庭合影

其冲的难题就是经费问题。在这方面，钟荣光“能掘土为金”，“化土丘为山岳”，岭南大学（包括其前身岭南学堂）多次濒于破产停办边缘，都有赖于钟荣光想方设法，广开财源，才得以一次次渡过难关。

岭南学堂建校之初，办学条件极为简陋。据校史记载，到1903年，学堂在广州城东南的康乐村购得土地10000多平方米，搭上盖板屋当校舍，学生只有百余人。筹措办学资金成为学校面临的最大难题。1906年，学校用董事局（当时该校董事局设在美国纽约）的资金建成马丁堂。时任学校教务长的钟荣光亲眼目睹过外国势力对中国各项事业的控制，不愿长期依赖外国人的捐款来进行学校建设，于是他开始发动广州的乡绅巨贾和学生家长捐款助教，为学校建造了第一批宿舍。宿舍建成后，他建议在宿舍的门楣上用铜

片刻上“某某书斋”，以纪念捐款人的善举。

此后，钟荣光募捐的范围由国内扩展到国外。1909年到1910年两年时间里，他的足迹遍及东南亚和北美洲16个城市。有一次，他刚到美国旧金山，就听到有人传言诽谤，不但自己不捐，还劝其他华侨不要捐。面对困境，他没有退缩，想方设法联系当地华侨联合会请来名戏班，在戏台周边展出广州和岭南学堂的照片，以唤起久居海外的华侨对故乡的感念之情。他还利用各种场合向侨胞描述岭南学堂的美好远景，并劝说侨生回国读书。他说，在岭南读书，不仅可以学到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还能够继承发扬祖国的传统文化，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广大华侨积极响应，岭南学堂因此募得第一批海外巨款，又为学校建成了一批宿舍。

岭南大学虽深具宗教色彩，却不属于任何一个教派，因此它不像其他教会大学那样由某一教会提供固定的资金来源，只是得到某些宗教组织的一些资助。尤其一战后，来自美国人士的捐款大为减少，岭南大学顿时失去了主要的财源。为了解决学校的办学经费，从1914年至1916年，钟荣光不辞劳苦，走遍北美洲各埠，先后成立“岭南学校共进会”30多处，从美洲推展到南洋各地。1917年，已任岭南大学副监督的钟荣光再次来到美国，



奔走于多个城市之间，发动华侨捐款，动员华侨子弟回国读书。回国后又向时任广州护法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孙中山和广东省省长朱庆澜请求援助。当时桂系军阀盘踞广东，护法军政府经济十分拮据，靠借债和华侨捐款勉强度日，为了支持钟荣光办教育，孙中山还是捐了2000元给岭南大学。再加上朱庆澜省长的拨款和华侨学生家长们的捐助，终于使岭南大学又渡过了难关。

1918年秋，钟荣光再次到新加坡、印尼、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地区向爱国华侨募捐，兴建归国侨生的寄宿舍。就在这一年，岭南大学特设华侨班，招收100多名海外归国侨生入学，开创了我国大学创设华侨班的先例。1924年至1926年，钟荣光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大规模的筹款活动。他与国文教授陈辑伍代表岭南大学访问中南美洲，获得美国石油大亨小洛克菲勒的资助，为岭南大学筹集了美金231.6万元，其中洛氏个人出资57.9万元。钟荣光当时称，“岭大”二字，至今才“有名有实”。

钟荣光近20年的辛勤奔波，不仅换来了岭南大学校园里怀士堂、格兰堂、永芳堂、十友堂、张弼士堂等十余栋美轮美奂的建筑，而且使岭南大学成为当时广东设施最先进、条件最优越的学校，而且是主要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建设起来的华南第一所大学。为了表彰钟荣光

的成绩，岭南大学在1924年建造了一栋以钟荣光名字命名的“荣光堂”。

自主办学 岭南重生

早在1908年担任岭南学堂教务长之初，钟荣光就决心改变学堂长期仰赖外国人的捐款来办学的传统，他说：“依赖外国人捐款办学终非善法，中国的学校由中国人自办才是正理。”“五四运动”时期，在举国日益高涨的反帝反封建形势下，他明确提出了收回帝国主义在中国办教育的特权，中国学校由中国人自办的主张，他认为：“吾家子弟何以全靠邻人教育，吾国土地岂可交与外国管辖？”

如何收回教育自主权，他也有比较成熟的考虑。他认为，中国的教育并不发达，不能不借助国外力量办学，但一味依赖，终非长久之计，应把握时机收回自办。其过程可分为三期：第一期，国人参与校务；第二期，国人应担负一定管理职责，筹措一部分经费；第三期，主权收归国人。对收回岭南学校的具体步骤，他认为第一步先收回岭南农科大学，再进而收回岭南之教育科、商科，更进而收回岭南全校。

此后，不仅在国内各种场合，而且在出国筹款过程中，钟荣光都一再宣传自己收回教育自主权的主张。

1920年，钟荣光鉴于中国以农立国，农业之改进为

当务之急，决心筹办岭南农科大学。这一利国利民的举措得到孙中山和护法军政府的大力支持。经军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协调，由广东省政府拨给开办费30万元，自1921年起每年补助常年经费10万元，并拨给土地6万多平方米建立农林试验场。纽约的学校董事局却无意扩办岭南农科，于是钟荣光决心摆脱对外国人的依赖，单独由中国人组成岭南农科大学董事会，负责学校的领导和经费筹措工作，这是我国人收回岭南大学外国人管理教育行政权的先声。

1924年初，钟荣光前往南北美洲为岭南农科大学筹款时，积极宣传收回教育权的主张。他在美国芝加哥城青年会上发表演讲时说：“兴办学校，实为现在救乡救国之事”，“岭南为中西合办，故不得受政治影响，但靠人终非久计，应当尽最发达，以得将来接收华人自办。”同年6月，他在致书美国芝加哥《少年报》主笔时又指出：“中国教育何以免外人管辖？外国政府及教会在我国所办学校，如与国际条约无背，不容易收归吾人自办，吾政府但按教育部章取缔之足矣。岭南则并非美国政府及教会所办，其始只一位美国传道中国之牧师所发起，托某教会管理，其后脱离教会，在纽约改组董事局担任筹款与派教员等事，至今董事屡易，全赖三五名望人物勉力维持，并加入中国董事



名人写真

名人写真

三人协助，至执行部则设在岭南校内，中国任部员者逐年增加人数，随时可收回自办。”他说，“论情应该感谢，在理则不应该长期倚赖他人，论事实则本校非美国政府所办之学校。”又说，“光服务岭南二十五年，由学生而教习而至今职，自信深知底里，苦心全力，以收回岭南自办

为惟一之目标。”他向华侨呼吁：“大家鼎力则收回外人在中国所办学校，当以岭南为嚆矢。”

1925年，岭南大学校友会提出：“改良学校组织，校友可推代表参与校务管理，增加董事局中的华人董事名额，董事局应在中国设立行政部门机构”等要求。1926年4月，岭南大学董事局在纽约开会，正在墨西哥募捐校款的钟荣光赶赴纽约出席会议，极力建议岭南大学应向中国教育部申请立案，并提出教会大学应归华人办理的主张。岭南大学同学会也致函董事局，要求改组董事局，将学校交回华人自主。同年11月，国民政府颁布私立学校立案规程，规定大学必须由中国人办理，外国人不得在中国设办大学。岭南大学董事局派出3位美籍董事来广州与有关方面协商。结果，决定在中国设立校董会，校董19人，其中15人为中国人，4人为美国人，



1912年，孙中山与岭南学堂教职员在马丁堂台阶合影。前排站立者右七为钟荣光，右八为孙中山。

并将董事会及岭南大学向国民政府申请备案。原设在纽约的岭南大学董事局改为岭南大学美国基金委员会。

在钟荣光的不懈努力下，1927年1月，一个按中国政府颁布的规则工作的、主要由中国人组成的岭南大学校董会正式成立，推举钟荣光为校董会主席和校长，筹备接收事宜。同年3月31日校董会向国民政府教育部呈请立案，8月1日校董会与旧董事会举行正式交接，从此全校主权收回，岭南学堂更名为“私立岭南大学”，成为中国第一所由外国教会设立而收归华人自办的大学。

尽瘁岭南 风范永存

岭南大学收回办学自主权后，对学校原有的教育方针进行改革，只强调以基督精神治校，不再以培养基督徒为主旨，学校的宗教色彩大为减弱。1928年，钟荣光

积极面向全国扩充校务，提出“岭南北伐”的口号。他说：“所谓北伐者，就是向北宣传之谓。因为岭南（大学）不单是要做广东人的大学，而且是要做全国人的大学，我们要极力地鼓励欢迎外省的，特别是华北的学生来这里求学……我们的北伐乃是要把岭南的内容宣传给国人，我们

希望有一天岭南（大学）的学生包括了各省分子，岭南（大学）成了全国的大学。”为此，他积极推广普通话：“但欲北伐必须先准备后方，学校当局对于各方面都有了相当的计划，而一件最可注意的，就是把国语（普通话）认为法定语言，使我不单是‘南大一家亲’，而且是‘中国一家亲’。”

钟荣光重视学以致用，强调办学必须结合中国的社会实际，学校开设科目达到400多种。在原有文理学院的基础上，先后增设了农学院、工学院、商学院。尤其是1930年，岭南大学接收了美国传教士创办于1866年的博济医院，这是孙中山于青年时代开始学医的地方。在此基础上扩建充实，建成了“孙逸仙博士医学院”，设立了包括解剖系、物理学系、细菌学系、药理学系、公共医疗系在内的6个学系。至此，岭南大学扩充为拥有6个学院30个系的多学科综合

文史春秋



大学，成为中国第一所与美国名牌大学互相承认学位、交换留学生的大学。学校理科开始招收研究生，颁授硕士学位。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岭南学堂早在1904年就开始招收女生，男女同校比北京大学1920年开禁早16年。

作为早期兴中会会员，钟荣光与孙中山私交甚笃，他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具有鲜明的革命精神和爱国内涵。他经常告诫学生，学生时代旨在求学，但在求学之中，应不忘爱国。有可以为国民利益的事，我们就要积极参与，为救国鞠躬尽瘁。他多次邀请孙中山到校向学生发表演讲。1912年5月7日，时任全国铁路督办的孙中山向全校师生作了《非学问无以建设》的演讲，殷切勉励岭南学子努力钻研文化知识，承担起国家建设的责任。1923年10月20日，孙中山在岭南大学召开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第九次全国大会上发表了《改良人格来救国》的演说，他认为，青年会提出以“人格救国”，是具有独特而重大意义的。他说：“青年会的宗旨，注重体育、智育、德育三项，改良人类来救国，是全国所欢迎的。国家是由人类凑合而成，我们要造成一个好的国家，便先要人人有好人格，自根本上做功夫，便是在改良人格来救国！”同年12月21日，孙中山到校视察，在怀士堂向全校师生发表《立志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

的演讲，他指出，古今人物名望的高大，不在于他做的官大，而在于他所做事业的成功。他勉励学生要做有益于社会的事，不可立意做大官，要重新把中华民国建设好，让民国的文明将来能和各国并驾齐驱。1924年5月2日，岭南大学举行“纪念黄花岗起义13周年大会”，孙中山应邀出席了纪念大会，并作了《世界道德之新潮流》的演说，勉励学生们要学习黄花岗先烈的志气和新道德，发奋读书，研究为人类服务的各种学问。孙中山说：“我们今天来纪念他们，便应该学他们的志气，更加扩充，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为世界来服务。”

在革命和爱国精神的熏陶下，岭南学子践行“作育英才，服务社会”的校训，学习知识，砥砺意志，秉承“诚实第一”“人格救国”“独立创造”“不自私”“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岭大精神被社会各界称为有冲劲、有耐力的“岭南牛”。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大规模调整，岭南大学所有院系分别被并入中山大学（现今的中山大学校园正是昔日岭南大学的校址）、华南工学院、华南农学院、华南师范学院和中山医学院，至此，具有64年悠久历史的岭南大学不复存在（1967年，香港复办岭南书院，1978年改称岭南学院，1999年升格为岭南大学；1989年，中山大学复办岭南学

院）。

岭南大学（包括附中及其前身）学子当中，不少是有影响的历史人物。格致书院开课之始，第一名投考入学的，乃是“革命四大寇”之一的陈少白（其余3人为孙中山、尤烈、杨鹤龄）。1900年谋炸两广总督而殉难的先烈史坚如，著名音乐家冼星海（被钟荣光隆重敦聘为银乐队指挥），画家高剑父、司徒乔，革命烈士李少白，近代革命家廖承志和廖梦醒兄妹，日本诗人草野平心等都是“红灰儿女”（因为岭南大学的校徽是红灰色的，岭南大学师生称岭大精神为“红灰精神”，称自己为“红灰儿女”）中的杰出代表。20世纪华南各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当中的业务骨干，出身岭南者不乏其人。

1942年1月7日，钟荣光在香港因心脏病逝世，享年76岁。1937年，年逾古稀的钟荣光曾预拟自己的挽联，总结自己的一生：

三十年科举沉迷，自从知罪悔改以来，革过命，无党勋；作过官，无政绩；留过学，无文凭；才力总后人，惟一事工，尽瘁岭南至死。

两半球舟车习惯，但以任务完成为乐，不私财，有日用；不养子，有徒众；不求名，有记述；灵魂乃真我，几多磨炼，荣归基督永生。

钟荣光辞世后，岭南大学师生将其办公地点“黑石屋”视为圣地，后继任各位校长皆谦让不肯入住。